

全球战略与安全风险



【报告摘要】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展望2024年，全球发展和安全仍然面临着多种风险和挑
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交织，其中
比较突出有五方面风险，将对世界
和平与稳定构成冲击。

2024

1月9日

一、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系统性风险概率显著上升

一方面源自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失调的潜在冲击，另一方面源自美西方国家围绕绝对安全和竞争优势强推多个平行贸易科技圈层的显性冲击。2024年多国面临大选，受其影响，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滞后甚至失误的外溢效应更加迅速和持久。部分国家民众面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不满和不安全感加大，社会不稳定性上升。

当前，世界经济虽在缓慢复苏，但仍相当脆弱，经济增长动力尚不明确、信心尚未恢复。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24年世界经济增速，各地区各国间分化扩大。受地缘政治干扰加大，贸易投资敏感度上升，碎片化倾向进一步加剧。由于疫情的“疤痕效应”，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部分国家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将制约部分执政当局尝试加强财政平衡的努力。

由于经济基本面、通胀走势存在差异，全球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分化加剧，全球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不能排除。

发达经济体或在更长时间保持高利率政策，但随着通胀压力缓解，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从2023年4月开始酝酿转向，紧缩步伐显著放缓，加息结束迹象显现，市场预期美国将于2024年年中或下半年转入降息周期。从就业和通胀表现看，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劳动力市场过热，工资水平增长较快，显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危险趋势，2024年几无可能将通胀水平降至2%的目标区间，意味着其利率水平将“更高更久”。尤其是美国经济“软着陆”可能性增大，美联储在货币政策调整上有更大活动余地，货币紧缩的滞后效应（一般认为会滞后9-18个月）将充分发酵，或持续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如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再度大幅上行、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等。

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巴西、智利等国承压更大，由于加息周期起步较早、实际利率仍处于高位，已率先进入降息周期。当前全球降息的国家数量已超过加息国家，新兴经济体面临外部融资困境，以及资本外流、汇率波动和通胀回升风险，易出现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

世界经济要素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现象愈演愈烈，全球经济治理权威与效能降低，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失速风险，甚至存在进一步碎片化的失控风险。近年来，在大国博弈、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下，全球产供应链屡次承压甚至中断，美欧等西方国家借力推国家安全优先的产供应链安全逻辑、产业干预强化下的竞争逻辑、多元化布局中的韧性

逻辑，加快驱动关键矿产、消费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全球供应链的非正常重构。尤其是美国力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积极纠集盟伴组建“小多边”式供应链联盟，以提升“集体经济安全”“去风险”为名打造排他性“小圈子”，如“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等，充斥着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全球经济若分裂成多个平行贸易科技圈层，将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构成严重冲击。

二、全球性挑战纷至沓来，全球治理机制应接不暇

各种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加剧全球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速度远超预期，极端天气频发，多国频繁出现高温、干旱、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和伴生灾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气候危机“灰犀牛”加速向人类走来，未来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全球核泄漏、核扩散风险升高，美在亚太地区强化“延伸核威慑”，推动美英澳合作，日本长期持续排放核污水、核电站风险不断，核泄漏核污染风险高企。多地恐怖主义抬头，非洲已成全球恐怖活动最严重地区，索马里“青年党”强势反扑，萨赫勒恐情面临失控，暴恐势力加速向西非蔓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滋生壮大，趁势作乱。受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粮食危机加剧，粮食生产及运输效率下降，出口大国纷纷出台限制粮食出口措施，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地粮食短缺状况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中东巴以冲突再起，难民潮和人道主义危机愈加深重。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机制备受冲击。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等持续撕裂国际社会合作共识，致使联合国权威严重受损，治理效率急剧下降。在安全治理领域，联大、安理会沦为大国权力博弈“角斗场”，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议而不决。在气候治理领域，虽有进展，但资金承诺、责任分担、技术共享、碳关税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依在。在经济治理领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欲推进改革，但仍面临发达国家重重阻力。为重振联合国权威，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一揽子全球治理改革方案，计划于2024年未来峰会付诸实践，国际社会围绕未来全球治理的争论再起。

全球治理去中心化、碎片化趋势明显。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弱化，为其他多边治理机制的兴起提供空间，各种“小多边、新多边”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金砖合作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容，二十国集团纳入非盟，均欲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加速整合全球盟友伙伴资源，新建各种经济、安全小多边机制，续推各种“小圈子”，蚕

食联合国权威，冲击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安全合作架构，客观上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形成竞争关系，导致全球治理去中心化趋势明显、碎片化倾向愈发严重，国际社会更难形成合力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三、两场冲突僵局难解，外溢风险持续发酵

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加沙冲突持续延宕，风险累积外溢，搅动大国关系、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度调整，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

俄乌冲突迎来关键一年。新的一年，俄乌冲突仍将呈现拉锯、消耗态势。受严寒气候影响，俄乌上半年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将继续在东线有限进攻，或拿下个别东部城镇，整体战线不会大变，但战场天平或进一步向俄倾斜。未来冲突走势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场大选。俄罗斯3月将举行总统大选，俄军在选前将较谨慎，尽量降低冲突影响；大选后则可能放开手脚，发动更大规模攻势，从而使战局更加激烈。美国在11月举行总统大选，若民主党继续执政，将延续现有立场，持续消耗俄罗斯实力，但援乌将受共和党掣肘；若共和党上台，美国对乌克兰政策势必大幅调整，有可能大幅削减对乌援助，压乌和谈。此外，巴以冲突升级，美援乌态度将更趋分化，平衡两场冲突的难度上升，美西方及国际社会对乌援助将进一步下降，加剧乌困境。同时，由于俄乌立场差距巨大，双方要实现和平难度很大，未来或将在战至力竭后达成停火协议。

在巨大的消耗之下，俄、乌、美西方等各方能力和决心将经受巨大考验，援乌疲劳症渐显，俄乌都难以长期维持现有烈度的战争。随着战事持续，各种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引发的各类风险将高企。**第一，战争外溢风险增大。**俄乌冲突除了正面战场外，双方均利用远程导弹、无人机等持续打击对方后方。许多打击针对民用设施，不可避免使平民被置于风险当中。尤其乌可能为干扰俄总统选举，加大袭扰俄境内目标力度。**第二，冲突长期延宕使各类次生灾害风险加大。**卡霍夫卡大坝、北溪管道、克里米亚大桥等关键基础设施均遭袭击，损失巨大。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前线，多次受炮火威胁。2024年，关键基础设施仍将面临巨大风险。**第三，俄与北约全线对抗风险上升。**俄乌冲突、北约北扩使俄罗斯和北约间已无任何缓冲地带，出现了一道纵贯整个欧洲的地缘分裂线。北约与俄在分裂线两侧激烈对抗。在南线，即俄乌交战区，事实上已发生俄与北约的代理人战争。在北线，芬兰加入北约，并与美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未来美军很可能进驻芬兰，其还将在波罗的海、波兰等加强部署。俄也会针锋相对，在白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俄芬边境加强部署，并重建列宁格勒军区。北线局势将更加紧张，从而带动整个欧洲安全面临巨大风险。**第四，加剧全球经济对抗和供应链碎片化。**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肆意制裁，加速

产供应链向区域、本土、短链化调整。全球化遭遇逆风，市场逻辑让位于安全逻辑，部分领域重现冷战阴霾。**第五，欧洲政坛或遭冲击。**2024年，欧洲将举行多场选举：英国将举行大选，欧盟将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俄乌冲突引发的移民潮和通货膨胀令极右翼势力获益，推动其在整个欧洲迅速崛起，可能成为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最大赢家。有预测认为，极右翼党派议员在下届欧洲议会中占据的席位可能从目前的130个增加到180个，从而改变欧洲议会的权力平衡。

加沙冲突长期化趋势明显。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以色列造成沉重打击，以军发动大规模报复，誓言“完全清除”哈马斯，但进展不如预期。2024年，以军将继续地面作战，不会轻易停火，以免哈马斯得到喘息之机。即便在国际社会压力下，以军或从高强度阶段转入低烈度和外科手术式打击，但预计仍会持续较长时间。哈马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很难被彻底清除，未来加沙的政治安排将更为棘手。

一是地区多线冲突酝酿新的爆点燃点。自2023年10月中旬以来，加沙冲突与地区多条战线已形成联动之势。在加沙激战的同时，中东反美反以军政组织与以色列、美国擦枪走火。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持续交火，伊拉克、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不断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截至2023年12月下旬袭击总数超过100次，也门胡塞武装向红海和以色列方向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迫使红海的美国军舰进行拦截，并组建护航联盟维护地区海上通道安全。2024年，中东反美反以军政组织还会保持对美、以目标的袭击频度，美、以则设法建立对这些组织的军事威慑。这可能导致新的冲突升级。以色列视真主党为心腹之患，内塔尼亚胡可能在加沙战后对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其规模将远甚于加沙冲突。美国组建护航联盟则可能激化其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导致红海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是对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外溢效应逐渐显现。**第一，加沙冲突对国际经贸和能源市场的影响渐现。**冲突延宕严重干扰国际商贸。红海年通航约1.7万艘船舶，占据全球海运贸易的12%左右，每天通过红海的石油或石油制品达到820万桶。随着商船绕行好望角，全球尤其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物流成本与时间大幅增加，部分国家的物价和通胀将走高。国际油价也面临上涨压力。**第二，加沙冲突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裂痕。**美西方力挺以色列，伊斯兰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情或支持巴勒斯坦。挺以、挺巴两大阵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斗争更趋激烈。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民意分裂。挺以、挺巴的游行轮番上演，针对犹太人或者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大幅增长，社会不安全感上升。**第三，加沙冲突将给国际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非国家行为体壮大。加沙冲突显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能够牵制甚至威胁传统的大国，它们将在未来的国际安全博弈中占据一席之地。

地区冲突联动风险上升。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经济发展失速、国际治理失能、社会认知失真、民众心态失衡。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加沙冲突不会是最后一场危机，很可能成为导火索引爆诸多长期冻结的地区冲突和地缘矛盾，“黑天鹅”“灰犀牛”或将频繁涌现。

四、少数国家刻意制造智能鸿沟，催生重大战略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将持续取得革命性进步。随着以大模型为基本技术架构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愈发清晰明朗。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是一条指数型曲线，未来10年就可能会出现远超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其生产力最终将远远超过当前人类社会所能产出的生产力总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甚至认为，通用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可彻底打破各领域之间的技术隔阂，未来生产、科研、金融、教育、医疗、法律等各类经济社会应用都可以在“通用智能内核”基础上搭建，促进人类社会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演变，与具身智能发展结合，把人类从枯燥、乏味的机械工作中彻底解放出来，走向空前繁荣和个性解放的智能时代。

美国把智能优势视为巩固霸权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战略界的广泛关注。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在《外交事务》2023年3/4月号撰文指出，通用智能时代与当前工业时代“后来者能够居上”的赶超逻辑截然不同，人工智能的自我迭代可能实现全方位加速领先，使“要么创新、要么消亡”的硅谷信条成为地缘政治法则，实现强者愈强、赢家通吃。与之相呼应，美英2023年6月发表《大西洋宣言》认为，由于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全球经济结构正经历工业革命以来最重大的变革，明确提出美西方须确保领先地位。为了建立所谓“人工智能领先优势”，美国不断加码对华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范围，并制裁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未来可能“至少每年”更新一次管控规则，目标就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推动人工智能和精密计算机领域实现突破的先进半导体”。美国片面地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竞争工具，损人不利己，正如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声明所言，“过于广泛的单边控制可能损害美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互不相通的人工智能体系可能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如果片面强调自身安全，不顾共同安全，各自发展互不兼容、互不理解的军事智能体系，未来可能加剧大国冲突和危机快速升级的风险。一是**酿成人道主义危机的风险**。2014年起，各国开始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开始讨论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及其管控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扩展，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大量使用智能系统识别目标、发起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杀手机器人”伦理风险的高度关切，二是**颠覆既有战略稳定逻辑的风险**。2021年，美军高官曾公开表态，感知得更快、决策得更快、行动得更快，在过去是作战优势，但在智能时代可能将成为作战必要性。究其背后逻辑，是因为军事智能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攻防成本对

比和协同进攻水平，从而颠覆“相互确保摧毁”这一战略稳定的基本逻辑。在军事智能化时代，美国可能通过智能感知、指挥和调度，日益具备一次性同时摧毁对手全部进攻力量的能力。先发全部摧毁的可能性越大，双方在危机时越倾向于抢开第一枪。

“计利当计天下利”。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人工智能也只是赢得竞争的筹码和武器；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才能真正让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帮助每个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是解放人、帮助人而不是伤害人、限制人，是提高社会繁荣、便利社会运转，而不是危害社会秩序、滋生社会动荡，应该是促进国际安全、维护和平稳定，而不是催生战略风险、诱发战争冲突。2024年将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一年，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可能迭代加速，人类社会是被不断扩大的智能鸿沟分割为难以逾越的两个世界，成为少数国家谋取霸权和私利的工具？还是所有国家所有人群都能公平地从人工智能发展当中受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战略抉择。必须立足共同安全，加强对话沟通，就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寻求共识、构建机制，避免军事智能化给人类带来本可避免的重大损害甚至灾难。

五、美国政治极化更形突出，将直接影响全球稳定

2024年，困扰美国多年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党派对立没有缓和迹象，**美国政治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呈现外溢危害全球的趋势。**

拜登任期尚余一年，仍希望续推重大变革、积累政治资本，但党派分歧使其立法议程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频频受阻。本应于2023年通过的新财年预算被推到2024年初，行政手段治国效力有限，政府关门风险仍然存在。2024年11月将举行总统、国会、州长及地方议会的大规模换届，其中总统选举更被视作重中之重。

拜登作为在任总统宣布谋求连任，党内初选获胜悬念较小，但因身体状况等原因，存在突然退选或无法履职的可能，为民主党的混乱埋下隐患。特朗普被视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有力竞争者，但面临4宗刑事诉讼，在3月初选、11月终选的同时段要面临密集司法审判。2023年12月，科罗拉多州以违宪为由剥夺特朗普被选举权，未来一年特别是3月党内初选前，可能会有更多不认可特朗普参选合法性的州效仿。届时，前所未有的争议将考验美国司法、行政体系，促使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社会等多个层面采取弹劾拜登、破坏治安等激烈报复手段。受此影响，美国民众关心的移民、堕胎、社会治安、政府债务等问题更难以解决，矛盾积攒可能集中爆发，部分非理性因素可能向西方世界蔓延，引发新的

跨国抗议浪潮。

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将影响美国经济的稳定性。2016年以来两党轮番执政，美国一半以上时间处于府会分制，两党始终无法弥合分歧。美国政府缺乏解决问题能力，美国政治精英亦思维混乱、战略迷茫。虽然美国经济、就业数据表现良好，但一些深层次问题未得到缓解。这些问题多数与政治相关，例如美国政府债务攀升、美国财政赤字、美国债务的信誉等。2023年9月，美国政府债务突破33万亿美元大关，在发达经济体中国债占GDP比重仅次于日本和意大利。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也在持续增加。据统计，2023财年前11个月，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61%。美联储加息导致债务利息支出攀升是赤字激增的原因之一。

债务规模、利息支出的持续升高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加大了美国债务违约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支出将挤占更大份额，让美国政府难以支撑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项目，削弱长期增长潜力；一旦债务违约，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将永久性提升。针对这一潜在危机，美国两党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共和党要求持续减税，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期盼以高增长对冲高债务。民主党要求征收“富豪税”，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投资，以“大政府”管理高债务。两党路径差异演变为政治矛盾，让年度预算、拨款、债务上限法案审议成为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压力让双方妥协更加困难，2024年很可能发生由政治纷争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

党派政治纷争亦对美外交领域决策带来影响，进而冲击全球稳定。两党在边境安全、对待盟友伙伴等方面高度对立，引导民众以党派偏见强化身份认同。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拖延、反复、不确定等特性，对全球稳定带来消极影响。据美媒报道，拜登“因内部分争”取消了原定于2023年5月召开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领导人峰会，使“澳大利亚备受打击”。2024年，选举活动将大幅牵扯美领导人精力，削弱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外界担心政党更替削弱美国危机管控能力，各国因安全感不足而普遍扩充军备，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各国也担心美国对外政策或再次反转，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下降，观望氛围浓厚。这也将拖延一些紧要国际问题的解决，甚至让一些问题错失最佳窗口期。

在选举压力下，美国两党都不希望被贴上“软弱”的标签，更有可能寻求对外展现强硬姿态、释放强力信号。因此，大选季的美外交政策面临更大的“政治化”风险。回顾2020年大选期间，美两党就曾在对华政策上竞相示强以争取国内政治优势。作为执政一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方面尽管有意维持对外政策的稳定性，但其深化对华竞争、强化同盟承诺的做法或令部分盟友伙伴更为有恃无恐，采取更加冒险的地缘政治行为，推升地区紧张。共和党方面则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优先”倾向，不少欧洲国家已开始忧心特朗普或类似政客执掌美国将损害跨大西洋关系，造成更大的战略不确定性。

展望2024年的中国： 动荡变革期维护稳定与促进发展的关键力量

世界大变局叠加动荡变革期，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凸显，风险挑战趋于增多。展望2024年，中国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内外兼修、担当引领，趋利避害、激浊扬清，为“多事之秋”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释放更大的正能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将进一步练好内功，着力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世界现代化进程。作为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和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2023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总体看，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近期多家国际机构纷纷调高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IMF驻华首席代表巴奈特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将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贡献1/3左右的动能，并预测中国经济在2024年将保持良好增长。

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将统筹推进三大全球倡议，努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步。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国对外工作将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协调推进三大倡议，积极致力于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进步。

习近平主席于2021年9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两年多来合作成果凸显，不仅缓解国际发展赤字，而且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已有70多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近200个务实合作项目被纳入项目库。

2024年中国将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着力携手把周边打造成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共同实施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中国于2023年2月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充实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4月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细化破解国际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概念文件》以“六个坚持”为理念原则，包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明显超越西方大国零和、片面、对抗、短视的旧安全观，为缓解全球安全治理赤字提供治本之策，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对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赞赏和支持。2024年中方将扩大维护共同安全国际共识，打造国际安全合作有效范式，探索热点问题和和平解决路径，坚持劝和促谈，管控地区争端，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适时举办以倡议为主题的高级别活动，携手将周边打造成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推动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等“四个共同倡导”，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方向。2024年中国将着力携手把周边打造成全球文明倡议首善区，弘扬亚洲价值观，以举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等为契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与此同时继续办好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等，推进中俄人文交流与中欧文明对话，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共同进步。